

徐博东 黄志平 著



【增订本】

甲傳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丘逢甲傳

(增訂本)

趙樣初署



著
徐博東
黃志平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丘逢甲传 (增订本) / 徐博东, 黄志平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108 - 0740 - 4

I. ①丘… II. ①徐… ②黄… III. ①丘逢甲
(1864 ~ 1912) - 传记 IV. ①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8798 号

丘逢甲传 (增订本)

作 者	徐博东 黄志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1. 2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740 - 4
定 价	48.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增订本序

新版《丘逢甲传》在海峡两岸出版有感

喜悉徐博东、黄志平两位学者合撰的《丘逢甲传》第四版“增订本”，在北京与台北分别推出简、繁两种字体的新版本，近期即将问世，对此，我十分欣慰，并表示诚挚的贺意。

丘逢甲（1864～1912）在近代台湾史上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清末民初的文史名家梁启超、黄遵宪、柳亚子、王芸生等都有过肯定的评价，表彰其倡导自主抗日保台卫国的义举，“颇足表现我中华民族之精神”，赞誉丘为“诗界革命之巨子”。但由于多种原因，上世纪的中叶，丘氏研究在大陆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三十多年来，海峡两岸文史学界对丘氏的研究日益广泛、深入，取得了许多共识。据悉，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在广州举行了由中山大学与台中逢甲大学联合主办的纪念丘逢甲诞生一百四十五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两岸学者对丘氏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都感到十分振奋，并一致认为，今后不应再纠缠于诸如“挟饷以去”等这类查无实据的所谓“疑点”或“难点”，理应转向深入探讨丘氏思想文化遗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上来。我觉得两岸学者的这个共识与建议，非常及时，也十分可贵。

丘逢甲先生辞世将近百年了，然而他留给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却弥足珍贵。我以为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族至上”的家国情怀

众所周知，对任何国家民族而言，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与影响力是最为深刻、稳定而持久的。人类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不止一个，但只有在黄河流域孕育并融合中华大地其他文明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仍能生生不

息，绵延至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元（蒙）清（满）人主中原的结果，进一步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多源（元）性，包容性和统一性。台湾与大陆虽有浅浅的海峡所阻隔，且历经荷兰、日本数十年的殖民统治，但其思想文化的渊源、特质与发展播迁，同大陆中华母体文化却密不可分；台湾人民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伦理观念、礼仪民俗、生活习惯等与大陆基本相同，这说明台湾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支脉和延伸，并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文明。近代台湾爱国先贤丘逢甲的成长历程，就是鲜明的例证之一。

丘逢甲出生于十九世纪中期，这时台湾人口的增长以闽粤移民为主转变为以当地居民自然生殖增长为主，作为台湾进入定居社会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视祖居地“唐山”为“原乡”，把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看作是自己的第一故乡，毕生怀有强烈的“台湾情结”和本土意识，但他所接受的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同样遵循“国族至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先贤古训，胸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深知国家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在青年时期的诗作《台湾竹枝词》中，他就既歌颂郑成功率部驱荷复台、“纳土内属、维我国家”的历史功绩，又肯定康熙帝统一台湾，筹固海防的积极贡献。他能突破东南海疆一隅的视野局限，从维护国家民族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高度来评史论事，确是卓识过人。

甲午战败后的一八九五年，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是伟大的正义战争，得到大陆民众和爱国官兵的广泛支持。割弃台湾乃腐败无能的清廷中央封建政府所为。丘逢甲作为一名在籍进士，其身份只是台湾几个书院的教师，并非胸有韬略、肩负守土卫国之责的边陲大吏，更非权柄在握的朝廷重臣，却能挺身而出，勇赴国难，倾家财组建义军，面对强敌，率众奋起抵抗。清廷割台界日，他“刺血三上书”，奋起抗争，继而倡建“台湾民主国”，力谋自主自救，“明知末着而势不能不拼而出此者”，这种不计成败利钝，不计个人得失荣辱的果敢行动，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以反抗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史家王芸生先生说得好：“当割台之势不免之时，台湾有宣布自主之一幕，其事虽昙花一现，然颇足表现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尚胜于不战而

亡也。”

在乙未抗日保台事败挥泪内渡之后，丘逢甲创作了大量的念台诗篇（“往事何堪说，征衫血泪斑……不知成异域，夜夜梦台湾”、“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其怆台之痛，念台之深，可谓字字血泪。他痛定思痛，矢志于兴教育才、图强救国的事业，坚信只要祖国强大就能收复台湾（“大九州当大一统”、“重完破碎山河影，与结光明世界缘”）。在丘逢甲的心目中，海峡两岸乃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谋求国家民族的富强与统一是至高无上的，并时刻把台湾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强弱兴衰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这种卓识是值得后人景仰和重视的。

二、“以民为本”，始终以苍生为念，与时俱进

“仁者爱人”是儒家力倡的最高道德原则，“仁”，集诸德之全，它超越了血缘宗亲关系，涵盖了忠恕，仁爱、孝悌、信义等诸多方面，它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历代先贤都很注重道德伦理的完善与自律。丘逢甲自幼受到父辈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深知仁爱、诚信乃为人处世之本。其父是乡村塾师，“邻居皆农家者流”，对台农“春作方忙”之甘苦忧乐深有所感，在青年时代作有《农歌》八首咏之，后又写《老番行》、《热风行》等佳作，对山胞艰辛劳作，却被迫辗转流徙的悲苦境况，表达了极大的同情与关注，吁请驻台大吏体恤民生、筹固海防。他跻身科举仕途的初衷，本是想借此实现“经世致用”、“报国效时”的理想，但见朝政昏暗、吏治污浊，他不愿与蝇营狗苟之徒为伍，也谢绝捐银“外放”的“劝告”（“家贫何术铸黄金”，“地瘠何堪再刮皮”），乞请“以亲老告归”，辞官离京返回台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建设故乡台湾竭尽心智。保台事败内渡后，他不知疲倦地探索强国复台之路，先是追随康梁变法维新，后又转而拥戴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晚年他眼见清廷日趋腐败，列强瓜分豆剖之阴谋得寸进尺，国事日非，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忧心如焚，寝食难安。盛夏时节，他捧着友人送来的西瓜，难以举刀（“金刀欲下躊躇甚，多恐神州似此分。”）友人赠他香米，“甫熟未及餐，已觉香流匙”，惊闻“徐淮被灾处，草木无根皮”，而“念此不能餐，北望挥涕洟”。丘逢甲这种忧国忧民的品

德情怀，感人至深。进入二十世纪，目睹天灾人祸接踵而至，他发出了“处处闻饥复闻乱，年年忧雨更忧晴”的深沉感歎。他本来担心暴力革命会损伤国脉元气，贻外敌予可趁之机，后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深得人心，清廷统治集团只知敲骨吸髓，荼毒生灵，无可救药，遂投身时代洪流，暗护革命党人，力促广东和平光复，讴歌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由此足见，丘逢甲的“民本思想”是根深蒂固、发自内心的。他始终以苍生为念，只要有利于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的福祉，促进国族的统一与富强，他就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规范自己的言行，努力与时代、人民、历史一同前进。

丘逢甲先生抗日保台卫国的历史功业与日月同辉，他兴教育才的业绩与丰富的诗歌创作也将永存于世，而上述两点，我认为则是他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今天，我们努力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的这些优秀思想文化遗产，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近两年来，台海和平持续稳定发展，两岸直接“三通”的实现，特别是“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订，使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展开，这无疑有助于促进两岸经济的繁荣和两岸同胞的福祉。目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面临着新的关节点，在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向深化？经济交流与合作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而文化交流与合作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核心。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思路，我以为，下一步我们在继续贯彻落实“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同时，应当加大力度，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推动两岸在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岸构建起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值此，新版《丘逢甲传》在北京与台北同时问世，应当说这是一种适时的、有益的尝试。丘逢甲先生是近代台湾人民的杰出代表，他的生平事功与丰富的诗作，表现了近代台湾同胞的品格，反映了他们的心声与诉求。乙未内渡后十七年，他追随先进社会力量，不懈探索图强救国复台的真理与道路，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光明、进步的追求；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折射出新旧世纪之交主要社会思潮与社会力量的消长与趋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社会价值。大陆读者通过新版《丘传》，可以感受到近代台湾同胞勤朴进取的思想品格，和他们历经的苦难与悲壮的斗争；而台湾同胞

则可从丘逢甲先生的人生经历中，了解到大陆同胞同样备受列强的欺凌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压迫的悲苦命运，以及为摆脱这种命运所进行的长期的艰苦斗争。历史昭示我们，两岸同胞本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当前，海峡两岸面对全球化下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趁新版《丘逢甲传》刊行之机，特撰此短文，略抒己见，就教于两岸方家读者。是为之序。

唐树备

2010年11月于北京

增订本说明

拙著《丘逢甲传》自一九八六年问世以来，先后在海峡两岸刊行三次，其中以二〇〇三年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较为完备，但此书在大陆书市无法买到。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北京时事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版《丘逢甲传》更早已售罄，无处寻觅。目前，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日趋热络，希望了解台湾历史的大陆同胞愈来愈多。另悉，大型历史剧《丘逢甲》也正在筹拍之中。鉴于此，在文史界前辈、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敦促鼓励下，我们将台版《丘逢甲传》加以补正充实，送北京和台北两地出版社审定，同时推出简、繁两种字体的版本，以应时需。

这次修订补正的要点计有：

一、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和近年来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传主的生平、家世的叙述，进行了若干补充修正。比较重要的有：改写了第三章的第二、三节，补充了传主参与保皇会密谋庚子武装“勤王”运动的史实；增补了新发现的有关丘逢甲出任广东学务公所议绅、惠潮嘉视学员和广东总教育会会长后，于一九〇七年呈报清廷的《复陈教育计划草案条议》，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与剖析；本书旧版及他人所撰《丘传》，多把丘氏生母陈掌妹说成是“福佬人家”的养女，现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更正为“屏东客籍武举人陈家的女儿”；关于丘氏出任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之相关记载与传闻，新版也增补了考证。

二、对近年来丘氏研究中的某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如有人将乙未抗日保台斗争，归结为“一场地域公民保卫乡土的战争”，台湾士民议立自主之举，亦被视为“中国当权者授意”所致。这是有悖史实、侮辱先贤的不实之词。本书依据史实，强调指出，武装抗日保台的主战场，虽在台湾地区，但举国上下配合抗争，千余举子“公车上书”，京沪报刊大力声援，部分驻台官兵与台湾义军并肩苦战，甚至捐躯沙场……。所以，乙未抗

日保台斗争是全体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统一而进行的伟大斗争。甲午战败，乙未割台，促成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改写了第五章的第二、三节，对丘诗的艺术特点和丘诗中的“台湾情结”，进行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分析。

四、附录中，《考评》一文对丘氏所谓“卷饷内渡”的不实指控，增补了若干重要资料进一步详加辨析；收入了徐博东撰写的《试论 1895 年“台湾民主国”的民主性》一文，以补充正文中有关评论之不足；将“丘氏五代简表”增补为“丘氏七代简表”；增补了台湾出版发表的有关“台湾民主国”和“乙未抗日”研究论著目录，以供研究者参考。

五、订正了旧版中的讹错文字。

总之，这次修订再版，我们力求更臻完善，但限于水平及史料，肯定还有不少欠缺与不足，敬希专家读者给予教正。

末了，要感谢国台办前副主任、海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为本书作序。感谢九州出版社祝松编辑所付出的辛劳。

今年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和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谨以本书的再版以资纪念！

徐博东 黄志平

二〇一〇年七月于北京

三版自序

《丘逢甲传》自一九九六年由北京时事出版社二版刊行至今已有七年，受到海内外舆论的重视和海峡两岸学术界前辈、同仁的肯定与鼓励，我们在此谨表诚挚的感谢。随着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日趋明朗，人们渴求了解和深入研究近代台湾著名历史人物丘逢甲的愿望与兴趣也益显浓厚。可是，在书市上，此书已经告罄。此外，从本书二版发行以来，两岸学者研究丘氏的学术活动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如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九年，台中逢甲大学先后主办了《丘逢甲与台湾历史文化》和《丘逢甲、丘念台父子及其时代》两次学术研讨会；二〇〇〇年春，广东社会科学院与汕头大学联合举办了《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的学术研讨会。笔者有幸参加了上述会议，聆听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许多高论，受到很大启发，从中获取了有关丘氏研究与丘氏佚作的不少信息与线索。

一九九七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吴宏聪、李鸿生主编的《丘逢甲研究——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六年专集》；花城出版社也刊行了丘晨波主编的《丘逢甲文集》；二〇〇一年冬，湖南岳麓书社推出了广东丘逢甲研究会组织编校的更为翔实的《丘逢甲集》，……所有这些科研成果与学术活动，都使我们感到不仅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二版进行修订与补正，使之接近和满足社会各界人士的期望与要求。

这次修订，保持原版的基本观点、结构框架和文字风格，主要是做了如下工作：（一）对新发现的丘氏佚作进行评介，如《诗畸》中披载的丘氏青年时期所作诗钟二一五联和律诗五十首、戊戌《感事》五律二十首，以及丘氏庚子南游的诗文与演说辞等。（二）对丘氏生平活动中若干史实与人物关系的变化作出必要的补充与交代，如己亥冬的秘密赴港之行，与丘菽园的交往与疏离。（三）凸显丘氏在乙未抗日保台活动中的作用，对近年某些贬损台湾民主国和台湾军民抗日保台斗争的论断进行考评。（四）订正旧版

中的讹错文字。此次修订工作，先由黄志平执笔完成初稿，继由徐博东统一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得到学术界前辈及同仁吴宏聪、戚其章、丘晨波、林大椿、李尚行诸位先生的指导与鼓励，戚先生还惠寄史料，提出中肯意见，钟敬文老师在生前也指出了旧版的不足。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王晓波教授、洪宜勇主编等，亦为本书在台湾的出版花费了大量心血。

在此，我们谨致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在三版刊行之际，我们十分感念赵朴初、林增平、徐森源三位前辈。赵老曾为本书原版亲笔题写书名，林教授为本书撰序，徐先生对本书的写作曾给予许多鼓励和支持。现在，他们都已先后辞世；在此，我们谨表深切的哀悼。

徐博东 黄志平

二〇〇三年八月于北京

修订版序

今年正值马关割台一百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光复五十周年，欣闻时事出版社决定出版由徐博东、黄志平合撰的《丘逢甲传》（修订版），我以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表示衷心的祝贺！

丘逢甲先生（一八六四～一九一二）是近代台湾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他出生在国家民族多难之秋，成长于祖国东南海疆前哨台湾。少年时代，丘逢甲的心底就孕育起了忧国伤时、反抗侵略的思想种子。身居台岛却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考中进士后，他弃官回台，锐意桑梓教育，为谋求祖国的富强而努力汲取新的思想营养，呼吁防御外敌的入侵。甲午中日战争初起，他即预感到台湾的危难，于是登高而呼，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倾家财以为兵饷”，投笔从戎，创办义军，以备战守。马关割台的噩耗传来，丘逢甲痛心疾首，拍案而起，“刺血三上书”，率领台湾绅民向清廷愤怒抗争，坚决反对割让台湾予日本。当一切努力均告无效，在“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丘逢甲又“义不臣倭”，力倡建立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奋起自主保台，为反抗日本侵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领土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事败后，丘逢甲满怀悲愤，饮恨内渡祖国大陆，定居广东。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内渡十七年，始终以“强祖国、复土雪耻”为职志，以“教育救国”为己任，不辞辛劳，长期奔波于潮、嘉、穗等地，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主持创办过多所学校，为国家民族培育人才，建树颇丰。晚年，更由赞助维新改良进而同情、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为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丘逢甲先生不仅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和进步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诗人。早于青年时代，其诗名即已享誉全台。内渡后，他有感于故土沦丧，报国无门，列强进逼，国是日非，创作了大量怆怀故土乡亲、抨击时弊和期待国家民族振兴、洋溢着强烈爱国主义思想激情的诗篇。他的许多爱国诗篇，催人泪下，感人肺腑，表达了近代中国人民对于外来侵略和本国腐败政治现实的忧愤与抗争，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屈辱，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丘逢甲在近代诗坛上的地位与成就，是有口皆碑的。本世纪初，梁启超就极为推崇，将他同晚清爱国诗人黄遵宪同誉为“诗界革命之巨子”。毛泽东、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丘逢甲的诗歌也十分赞赏。记得一九七四年在选举第四届全国人大台湾代表团代表时，叶剑英同志接见全体台胞代表，亲切地对我们说：“清末台湾有个爱国诗人丘逢甲，你们知不知道？他的诗写得很好，很感人！”

然而，对于丘逢甲这样一位颇为值得纪念的爱国人物，长期以来大陆学术界却甚少有人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丘逢甲研究才开始活跃起来，学术界相继发表了一批较有学术水平的论文。徐博东、黄志平在广泛搜集资料并参考、吸收了海峡两岸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认真探索，撰写出了第一部评介丘逢甲生平思想和业绩的专著《丘逢甲传》。八年前，当我拜读到这部著作时欣喜不已，这不仅因为该书作者之一徐博东教授是我看着他从小长大成人的后生，如今他已学问有成，令我欣慰；更因为这部书的问世填补了大陆台湾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还因为这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结构严谨，语言通俗流畅且富有文采；（二）资料丰富，对史料的考证、鉴别严肃认真；（三）不囿于陈说，敢于触及学术界历来有争议的疑点、难点，提出自己具有独创性的新见解；（四）对丘逢甲的评价较为中肯和实事求是。总之，我认为这本书较为全面、系统和客观地记叙了丘逢甲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爱国志士、杰出诗人和进步教育家的光辉一生，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力作。该书出版问世后，受到海峡两岸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不是偶然的。现在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补充，吸收利用了近几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学术界

丘逢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原书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提高，我相信，该书的重新出版，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值本书出版之际，欣记如上感想，为之序。

蔡子民

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北京寓所

